

On The Extinction of *Ta Kung Pao* in Mainland and its Influences

Jiang Weidong

Abstract: The extinction of *Ta Kung Pao* in mainland took pla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outbreak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Under the pressure of changing its name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a Kung Pao* had to be renamed *Forward Daily* for survival and was criticized as “to escape by cunning maneuvering”. After 105 days of struggle, *Ta Kung Pao* eventually died out from the Chinese mainland. As for the reason of extin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cro historical structure, it is the malignant development of Left Ideological Trend and the policy environment that lead to its fading o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cro action analysis, it is the result of rational or irrational choices and continuous interaction made by relevant actors under the restriction of historical structure. Although it has long disappeared from the mainland China, as a spiritual symbol and an expanding symbol system, *Ta Kung Pao* continues to soar up into the spiritual sky over the journalist community through a variety of ceremonies and discourses, influencing the communication practice of generations of Chinese journalists.

Key words: *Ta Kung Pao*; Extinction; History of journalism; Civil-run newspaper; CPC

试论大陆《大公报》的退场及其余响

江卫东

摘要: 大陆《大公报》退场过程发生于“文革”爆发初期，在内外改名压力之下，《大公报》虽经再三努力，不得不蜕变为《前进报》以求适应环境而自保，又被批为“金蝉脱壳”，

作者简介：江卫东，重庆三峡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新闻史论。

课题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中国共产党改造《大公报》（1949—1966）策略研究（17XXW006）”阶段性成果。

文章引用：江卫东. 试论大陆《大公报》的退场及其余响[J]. 中国新闻评论, 2022, 3(3): 94-105.

<https://doi.org/10.35534/cnr.0303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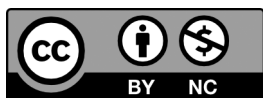
再经105天挣扎，最终从中国大陆消失。究其退场缘由，从宏观历史结构层面看，是“左”倾思潮恶性发展与政策环境渐趋紧张导致其无奈退场的大趋势；从微观行动分析层面看，是有关行动者在历史结构制约下进行理性或非理性选择，不断进行互动博弈的结果。尽管《大公报》早已从大陆现实世界中消失，但它作为一种精神象征和一个不断膨胀的符号系统，透过各种各样的仪式和话语，持续回响在新闻社群的精神天空，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新闻人的传播实践。

关键词：大公报；退场；新闻史；民营报；中国共产党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大陆《大公报》在1949年后经历艰难曲折的“新生”之路^①，从初期天津、上海、重庆三家报馆并立，演变为北京《大公报》硕果仅存，又从典型民营综合大报努力转型为财经专业党报。然而，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如燎原之火蔓延全国，四个月之后，《大公报》（下文泛指者均指大陆《大公报》）“新生”之路走到了尽头。这张诞生于晚清，历经民国改元、军阀混战、十四年抗战、三年内战、新中国建立等历史风云，可谓饱经沧桑、风尘仆仆的民营大报，最终结果却是从大陆退场、仅余香港《大公报》以续其脉，这是当初很多人所没有料到的。然而，《大公报》“文章报国”的精神及新闻专业主义风范依然山高水长，余音不绝。

一、退场：从《大公报》到《前进报》

《大公报》的最后阶段发生于“文革”初期。1966年6月初，中央财贸政治部派出工作组进驻报社，中旬，财贸部工作组撤出后，陈伯达又指派解放军总政治部派遣三人工作小组进驻《大公报》。6月13日和22日，北京《大公报》发表社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红旗乘胜前进》《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为“文化大革命”做宣传。

^①江卫东.《大公报》“新生”历程之动态观照[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6(2).

尽管如此，报社各层级领导仍然被迫不断地写检查、挨批斗，报社内部正常工作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与此同时，报社外部红卫兵、造反派等猛烈抨击《大公报》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报纸”，要“砸烂”《大公报》牌子。因此，报社不得不用一块红布把“大公报”三个字遮掩起来。屋漏偏逢连夜雨，《大公报》版面上出现的“巧合”，更令大公报人心惊胆战。有一天，报纸二版上“砸烂……”的黑体字标题，透过阳光两面对照，恰巧落在一版毛泽东像的耳朵上。红卫兵电话声讨《大公报》“用巫师的手法陷害伟大领袖”，要揪斗报社总编辑。无独有偶，“八一”建军节那天，报纸第四版画刊上恰巧有炮口指向报纸头版上的毛主席像，于是被指控为“《大公报》要炮打毛主席”^①。

在这种“内忧外患”煎熬下，报社感到强大的社会压力，甚至有难以为继之感。怎么办？面对此种新“环境”，人类行为的“理性选择”机制开始发挥作用。考虑到《大公报》沉重的历史包袱，大公报人想到的应对之策是仿效《光明日报》用毛主席的字作为“新报头”的自保办法。1966年7月27日，北京《大公报》负责人给“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顾问康生写了一份请示报告，反映报社存在的问题，主要内容说读者来信要求改掉报名（《大公报》报头字体，是1902年创刊时由严复先生题写），因为那三个字是地道“保皇派”的牌子，面目可憎。如果现在改名不行，最好立即改掉原报名的写法。^②

可是，康生把球踢给了李先念。8月22日，报社党组书记、总编辑常芝青首先给分管财贸的副总理李先念打了一份报告；三天后，报社党组又直接给毛主席写报告。毛主席将报告批转给“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处理，球又回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最后处理意见是：报名用《前进报》，表示“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每周出版三期对开小报。由于更名仓促，报头用字直到临近创刊才根据周总理指示，“按鲁迅字先出版”^③。

1966年9月15日，《前进报》创刊。北京《大公报》由此改名出版，对这个结果，大公报人起初“全体哗然”，大为失落，但也只能接受现实。常芝青还宽慰大家说，他以前办过《抗战报》和《晋绥日报》都是小报，“办小报是老区的传统”，“办好小报比大报还难”^④。

应该说，《前进报》“是文革年代迫于形势仓促应变的产物，报道内容也大多是随波逐流，刊登千篇一律的‘左’的东西”^⑤。虽然《前进报》紧跟“文革”进程进行大力宣传，但随着“文

①张颂甲。《前进报》的创刊与被封[J]。百年潮，2004（8）。

②方汉奇。《大公报》百年史：1902. 06. 17—2002. 06. 17[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52—353。

③方汉奇。《大公报》百年史：1902. 06. 17—2002. 06. 17[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53。

④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编。常芝青传[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301。

革”深入发展，报纸也感到处境困难。12月21日，报社领导再次给中央写信，表示“赞成出小报，但不赞成隔日刊”，而且目前报社内部文革运动进入高潮，维持正常出版而不出事故已非常困难，故希望暂时停刊。经“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批准，《前进报》拟于1967年元旦暂时停刊。

但是，未到元旦，1966年12月28日夜，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战斗队“孙大圣支队”的学生们冲进编辑部宣布封报。报社门口贴出了白纸大字的“讣告”，历数《前进报》“罪行”，宣布“验明正身，寿终正寝”。12月29日，《前进报》虽然昨晚已编好并由张颂甲签发，但终究没有出刊，却出版了一页“海报”类东西，正面印有《告读者书》，背面印有《〈前进报〉被判以死刑》的“判决书”。

《告读者书》批判《前进报》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办报路线”，“大搞知识性和趣味性”，恶毒反对毛主席。死刑“判决书”列举了北京《大公报》“六大罪状”，指控其抬高刘少奇贬低毛主席，拒不刊登雷锋日记，充当帝修反和国内牛鬼蛇神的应声虫，宣扬资本主义的经营方针，没有转载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还特别指出《大公报》耍了“金蝉脱壳”之计云云。同时，该“判决书”还控诉《前进报》“两大罪状”，指责其对“文化大革命”摆出“超然面孔”，采取所谓“不介入”^①政策。

显然，这些所谓“罪状”带有欲加之罪、无限上纲的色彩，并无多少事实依据。但是，从其反面，倒是或多或少可以读出北京《大公报》在极左政治甚嚣尘上年代里一些难能可贵之举，尽管这些行为可能并非其有意为之。

在红卫兵炮轰下，《前进报》仅仅存活105天就被迫停刊。粉碎“四人帮”后，一些老大大公报人联名上书中央领导同志，要求恢复北京《大公报》。1978年，李先念副总理想办一张以财贸为主要宣传内容的报纸，于是调集原北京《大公报》总编辑常芝青等8人进行筹备。这应该是复刊《大公报》的极好机会，但是因有不同意见，复刊终成泡影。

二、《大公报》退场的缘由

根据20世纪著名美籍华裔政治学者邹谠先生的观点，一个历史变迁的发生，既要从宏观社会结构的制约中寻找其可能性和大趋势，也要从微观主体行动分析中发现历史发展的选择性和偶然性。^②因此，《大公报》从大陆退场的缘由，不妨从宏观历史结构原因和微观行动原因两个层面展开思考和讨论。

^①方汉奇：《大公报》百年史：1902.06.17—2002.06.17[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55-356。

^②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238。

（一）宏观结构缘由

宏观看,《大公报》退场于“文革”初期,恐非偶然现象,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结构原因。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深重灾难,是新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大挫折,其负面影响至今不绝,正如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全国两会答记者问时所指出,虽然实行改革开放几十年了,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甚至发出“‘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的严重警告^①。导致“文革”的诱因是多重的,但主导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内以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错误认识为主要特征的‘左’倾思潮恶性发展,并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②。在笔者看来,《大公报》消亡于“文革”,“左”倾思潮恶性发展是根本原因,一方面表现在对新记《大公报》的定性与评价不够客观公允全面,失之于上纲上线;另一方面表现为对1949年后《大公报》“新生”与转型的认识、评价不符合实际情况,阶级斗争思维盛行,很多人的认识仍然停留在过去的刻板成见,失之于主观和僵化,也使得《大公报》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致其“新生”之路艰难曲折,最终踏上不归路。

据有关研究,“左”倾思潮一般具有这些特征:(1)强烈的权威崇拜倾向;(2)恐惧资本主义;(3)思维僵硬、狭隘、极端;(4)行为狂热、野蛮,带有明显的愚昧性。^③从上述《大公报》退场过程的描述,不难看出,那些要求砸烂《大公报》牌子的红卫兵们是如何权威崇拜、思维是如何极端狭隘僵硬、行为是如何狂热野蛮;同时,也不难看出,他们对《大公报》的批判乃至最终取缔其存在,主要理由就是《大公报》的“资产阶级报纸”定性。尽管新中国成立后对《大公报》“资产阶级办报思想(新闻观点)”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进行了十几年持续不断的批判,在《大公报》已经转型为中央财经党报之后仍然有很多人抱持刻板成见不放,甚至在“文革”后有人对复刊《大公报》还心有余悸,恐怕主要还是出于类似的理由和考虑。由此可见,在对《大公报》的认知、评价和取舍等方面都明显存在“左”倾思潮的影响。

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共产党要防右,但主要是防“左”。为什么“左”倾错误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侵蚀党的躯体,导致党一次又一次付出沉重代价?胡乔木同志作为党中央的一支著名“笔杆子”,也是党史上一系列重大决策和事件的亲历人和见证人,对此做过一番思考,认为中共之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犯20年的“左倾”错误,主要有五个方面原因,即追求超高经济发展

^①温家宝. 政治体制改革不成功文革有可能重现[EB/OL]. (2012-03-14)[2022-07-09]. http://www.china.com.cn/v/zhuanti/2012lh/2012-03/14/content_24894186.htm.

^②金春明. 六十年代“左”倾错误的发展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J]. 中共党史研究, 1996(1).

^③朱华. 中国共产党历次左倾思潮探源[J]. 探索与争鸣, 2005(6).

速度、相信经济建设不能离开阶级斗争、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国际环境恶化及其过火反应、文化落后和民主缺乏等。^①

还有研究者从分析“左”倾思潮的本质入手，试图对这个令人头疼问题做出回答。他认为，党内“左倾”思潮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观念、作风在政治领域内的集中反映，而“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成分，一直是以小资产阶级出身者为主。直到1956年，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仍占80%以上。”^②换言之，党内存在着滋生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深厚土壤，一旦遇到合适的气候与条件，比如党的领导机关发生失误或者党内混入品质恶劣分子推波助澜，“左”倾思潮就会迅速泛滥成灾，所以党员成分是党内“左倾”思潮长期严重存在的根本原因。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比如权威崇拜、绝对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因历史悠久而特别强大和顽固，不可避免地对共产党人产生间接或直接的影响，这也是党内“左”倾思潮的重要思想根源^③。兼有革命者与思想家双重身份的党内理论家，王元化先生也深刻指出，“五四”时期流行的激进主义思维模式是后来极“左”思潮的根源。而这种激进主义传统可以追溯至几百年前明末泰州学派^④。

从政策环境看，中共改造《大公报》政策与策略的实施与导向，也构成其最终退场的宏观结构性原因。1949年允许《大公报》宣布“新生”后继续出版，是新政权权宜之计和统战策略。众所周知，新政权本来是准备取缔《大公报》、不准其继续出版的，因为早在1948年夏恽逸群就将其定性为政学系“强有力的舆论武器”，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表面上使读者觉得它颇为公正，并不偏袒蒋政府，实际上则偏袒得最有力，最有效果”^⑤，是年底中共中央也肯定了这一政治定性，初步决定“不让其继续出版”。但是，由于天津《大公报》改名换姓为《进步日报》国内外舆论哗然，再加上当时《大公报》主持人王芸生“投效—投诚—投降”的表态，新政权才将《大公报》“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定性，修改为进步的“人民报纸”，允许其宣布“新生”。但刚刚宣布“新生”后第三天，范长江通过“民营”改“私营”的定位，又给《大公报》戴上一顶“资产阶级”帽子，在“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尚有一点“进步性”而暂时成为“统战对象”。然而，从新政权阶级斗争理论和政治使命来看，资产阶级最终也是要在“消灭”之列。因此，在对《大公报》长达十七年的改造过程中，从最初“原封不动”策略到“旧瓶装新酒”策略再到彻底党报化策略，党报化是改造者与被改造者共同追求的目标。然而，最终虽然已经转型为财经专业党报，但资产阶级报纸的刻板印象还是如影随形，“小骂大帮忙”的历史问题

①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M]//胡乔木：胡乔木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74-279。

②朱华：中国共产党历次左倾思潮探源[J]。探索与争鸣，2005（6）。

③吴琦幸：王元化传[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425-520。

④翦勤：蒋党真相：三十年见闻杂记之一[M]。琼海：新华书店，1949：86-88。

仍然阴魂不散，以至于保留原报名都变得不合时宜。显然，这种政策环境的变迁过程也促成了作为“资产阶级”报纸象征的《大公报》，势必要在新中国迈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程中一点点褪色，直至其从中国大陆完全退场的大趋势。

（二）微观行动缘由

从微观行动分析角度看，在有些人眼里，《大公报》“罪孽深重”，并且是与生俱来的“原罪”，他们为了表达彻底的革命性，必然拿起批判的武器和进行武器的批判。同时，作为另一方的历史行动者，大公报人无论怎么努力进行自我批判、脱胎换骨改造，其“罪”似乎也是“赎”不清的，其命运也只能是被“扫进历史垃圾堆”。

经过新政权反复审阅的《大公报新生宣言》认为，《大公报》表面上始终穿着“民间”“独立”外衣，实际上与国民党政权有着“血肉因缘”；表面上始终维持着改良主义者面貌，实质上成为反动统治阶级的“帮闲甚至帮凶”；总之，在过去二十几年中，《大公报》属于官僚资产阶级，在每个大的阶段，基本上都站在反动方面。

带着这样一种“原罪”进入十七年“新生”过程，虽经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的批判、改造和整肃，这些罪孽依然“阴魂不散”。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和1957年“反右”运动对《大公报》的批判及其自我批判，就是比较典型的两个案例。

“思想改造”运动的批判火力主要集中在批判“资产阶级办报思想”，结果是“在办报思想方面的‘集纳主义’‘客观主义’‘形式主义’‘技术观点’‘客卿思想’‘营业第一，广告第一’等错误思想，在个人思想作风方面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等恶劣作风，都受到严格批判”，那些曾经具有职业自豪感的大公报人经过改造“一般地都有空虚的感觉，感到‘两手空空，一无是处’”^①。

然而，思想改造谈何容易，五年之后的“整风反右”运动再次把矛头对准“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原北京《大公报》副总编李光诒描述了报社内“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1953年《大公报》与《进步日报》合并出版，担负起财经宣传任务。但是，由于《大公报》系“旧报纸”，编辑记者受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影响较深，报纸虽经几次改组，报人虽经思想改造运动，但是他们仍然向往“同仁办报”和“文人论政”，不愿意按照党的意图办事，对于办财经专业党报心存抵触，甚至公开反对。在反右整风运动中，我们和右派分子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彻底批判了资产阶级新闻观点，鲜明树立依靠党、依靠群众办报观点，坚定不移地把《大公报》办成一

^①上海档案馆. 沪委宣(52)字第1189号《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总结》[A]. 档案号: B36-1-14: 19.

张以财经宣传为主的报纸。^①由此可见,即便经过如此长期、猛烈的政治改造和批判,《大公报》的原罪也是难以“赎”清的。

何以如此?一方面,改造人的思想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另一方面,恐怕与大公报传统与大公报人的“骄傲”(李纯青语)有关。《大公报》曾经是一家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和广泛社会影响的民营大报,1949年前确实是中国报界的“舆论重镇”,“在中上层社会中曾有一定影响”^②,也是唯一获得密苏里奖章、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中国民营报纸。因此,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大公报》慢慢形成了“文章报国”的爱国情怀、“书生论政”的“敢言”传统和“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专业主义办报方针,大公报人内部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并使之成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石和归宿,当然不会轻易变更和放弃。虽然在外部环境高压之下,他们也会根据政治形势和现实需要进行无限上纲的自我批判,但很难真正做到“触及灵魂”和“灵魂深处闹革命”,一旦气候变化就会“死灰复燃”。

所以,虽然在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交互作用之下,《大公报》逐步实现了从民营到公私合营再到党办,从享誉中外的综合大报到有财经和国际宣传特色专业党报的转型和变迁,但是不少人依然视之为“资产阶级报纸”而只将其作为“内部参考”,发行和传播因而受到局限,采访报道工作因文件不让看、会议不让参加而受到歧视和阻拦,记者编辑内心感到自卑而对《人民日报》、新华社等纯正党媒充满向往,因此有人抱怨“螟蛉义子”和“亲生儿子”的差别待遇。尤其是在“整风反右”运动中,老一代大公报人对“旧大公报”的感情和怀念自不待言,年轻一代也有不少人主张恢复“旧大公报”,由此可见“大公报”这三个字影响之大之深!

正是鉴于此,常芝青感觉到“大公报”这三字招牌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相反倒有诸多不便,妨碍报社履行其作为财经“党报”的使命和职能,必须“斩草除根”,连牌子都不能留。因此才有他不断向中央上书陈情、意欲摘掉这块牌子的举动。当然,最终也由他亲手摘掉了这块“臭名昭著”的资产阶级牌子。更有甚者,在“文革”结束后,中央要办一张经济类报纸,有人提议恢复出版北京《大公报》,但还是有人认为“大公报”这三个字有问题,最终使得《大公报》成为在“文革”后唯一没有复刊的中央级报纸。

由此可见,不论是砸牌的红卫兵们、摘牌的常芝青,还是保牌的大公报人,他们都是历史行动者,大陆《大公报》的退场就是在宏观历史结构制约下,这些行动者通过理性或非理性选择机制,进行一系列互动博弈的结果。

^①李光治. 大公报是怎样坚持发扬财经特点的[J]. 新闻业务, 1961(1).

^②编辑部. 大公报新生宣言[N]. 上海大公报, 1949-06-17.

最终,《大公报》在大陆遂成“绝响”。

三、余响:“大公精神”长存

虽然《大公报》从中国大陆消失已半个多世纪,但是“大公报”这三个字似乎从未消失在中国历史的天空,不论毁之誉之,这三个字的确不时回响在国人耳际。不用说20世纪60年代王芸生、曹谷冰合写的那两篇“颇多无限上纲和自诬、诬人之词”的关于《大公报》的回忆性文字,就是在十年文革中那些铺天盖地的大批判话语里,这三个字也还不时闪现。1978年后,对《大公报》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研究才正式开始,专著论文的数量难以计数,专史、全史、断代史、百年通史应有尽有,研究涉及《大公报》的广告、评论、副刊专刊、报人、经营管理、人才战略、办报理念等各个领域。通过这些研究和言说,《大公报》作为中国近现代民营报刊典型代表的形象日益清晰;同时,新记《大公报》的“四不”方针成为当今众多新闻从业者进行专业化操作和实现职业认同的重要话语资源,成为他们连接新闻业历史传统和媒介现实的理想愿景和集体记忆。^①尤其是《大公报》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所承载的“大公精神”,在一代代新闻人心里生根开花、在新闻社群中传承光大。正如郭恩强指出,《大公报》已经不是简单的一张报纸,而成为一种“作为政治、社会文化表征的《大公报》现象”,“在国际社会、中国官方、新闻界等各方力量合力下被塑造成新闻社群的典型及新闻职业象征性符号。”^②

(一) 仪式的纪念

1966年作为报纸的《大公报》从大陆退场后,作为话题的《大公报》似乎并未消歇。“文革”期间,作为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代表,《大公报》经常以“他者”形象不断遭到点名批判和挞伐。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拨乱反正”“新时期”的到来,为《大公报》“辩诬”之声渐渐由弱变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大公报》的研究形成热潮,至2002年《大公报》百年诞辰之时,“《大公报》热”成为一种“现象”,从一度“臭名昭著”到历史芳华再现。那一年,为纪念《大公报》百年诞辰,香港《大公报》社长王国华还专门填词创作了《大公报之歌》,试图表达《大公报》百年发展史及其所体现出来的“大公”精神。

香港《大公报》在“一百周年报庆”时开展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举办盛大的“庆祝酒会”和“一百周年文艺晚会”,开展“世界报业发展论坛”“大公报百周年纪念杯赛马”活动及通过邮政部门发行大公报百年纪念邮资封、纪念邮票等,原国家主席江泽民题词祝贺,人大

①黄瑚.序二[A]//郭恩强.重构新闻社群:新记《大公报》与中国新闻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1.

②郭恩强.重构新闻社群:新记《大公报》与中国新闻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259.

副委员长成思危为代表的中央和各级政府高层都曾亲临有关活动现场。此外,《大公报》香港馆还编撰出版“大公报一百周年报庆丛书”作为献礼,包括《大公报一百年》及社评、头条新闻、副刊文粹、新闻案例、环球特写等文选共10册,同时在报纸上开辟专栏,对这些书籍进行推广和介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有两项活动特别有意义:一是当年3月至6月开始的“百年大公报寻根之旅”活动,由香港和内地记者组成采访团,从香港出发,沿着《大公报》曾经创办分馆的路线进行“寻根”;二是“大公报百年版面回顾展”在多地展出,香港、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政府高层和“知名人士”出席开幕式并剪彩。

除了香港《大公报》自身上述“仪式性”纪念活动,大陆的新闻社群同行也参与其中。《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新闻媒体转载了香港《大公报》社长王国华撰写的纪念文章,人民网开辟“纪念《大公报》百年华诞”专题给予特别关注,《天津日报》举行“大公报与天津”的主题座谈会,历数该报“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所创建的一桩桩丰功伟绩”^①。

与此同时,学术界对《大公报》的讨论和研究也可谓热闹非凡,众声喧哗。笔者2022年2月7日在中国知网以“大公报”为主题词,对相关文献进行搜索,得到5054条结果。分析这些研究成果,关于《大公报》的讨论不外乎三种路径、框架和视角:第一种即“党史、革命史”路径,大部研究都属此类,从“中间报纸”“第三势力”的预设立场或“民族国家”意识的预设价值出发,重点关注《大公报》的政治属性、立场站队、功过二元评价等问题;第二种即“自由主义”路径,“从报人言论与行为中阐发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性”,或者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而将《大公报》定位为“文人论政”报纸,或者立足于西方影响而关注《大公报》对独立、民主、自由等理念的宣扬;第三种即“新闻专业主义”路径,“从中国新闻改革过程中对‘新闻专业主义’诉求的角度言说《大公报》”,把《大公报》看成能为中国新闻业树立“‘主流新闻观’和职业信仰的典范报纸”^②。

总而言之,不论是作为“他者”的批判,还是对逝去“传统”的追寻,不论是轰轰烈烈的纪念活动,还是静谧书斋里的研究探讨,不论是官方的“统战”或“公关”动机也好,还是新闻社群共同记忆重构也罢,这些种种记忆、言说、叙事和书写其实都是一种“仪式”,它使人们对《大公报》的记忆一直处于“激活”状态,使得《大公报》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行业标杆对中国新闻事业发生持久影响。

(二) 精神的继承

不仅如此,《大公报》百年所凝聚的“大公精神”还在更多方面影响着现实中国及大陆新

①郭恩强. 重构新闻社群: 新记《大公报》与中国新闻业[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226-231.

②黄瑚. 序二[A]//郭恩强. 重构新闻社群: 新记《大公报》与中国新闻业.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3-4.

闻人。2022年6月12日,在《大公报》创刊1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去贺信,给予《大公报》“立言为公,文章报国”的办报宗旨以高度评价,体现了国家层面对于《大公报》的总体性肯定。

何谓“大公精神”?在王国华看来,“大公”两字就是“百年《大公报》的一贯精神,更是中华民族的崇高精神的写照”^①,具体来说,“大公”精神主要表现为超越小我私利、追求报国利民的博大情怀。2002年6月17日,香港《大公报》发表题为《大公报之精神》文章,更明确地把英敛之初创时的“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新记时期的“不党、不私、不卖、不盲”方针,以及获得密苏里奖时所阐述的“我们对任何人或党派无说好说坏的义务,除去良心的命令以外,精神上不受任何约束”等“追求和表白”,统统纳入“大公报之精神”内涵当中。有学者研究分析了《大公报》所强调和张扬的“公”或“大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变化轨迹,指出“大公理想”或“大公精神”的内涵既有道德层面意义,更有政治层面含义,“为中国报界明晰地树立了新的坐标”,“即创办独立报纸,代表民众利益,推动民主政治建设”^②。

按照这样对“大公精神”内涵的界定,来观照现实中国的报业状态,无疑是极具针对性和启发性的。如前所述,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一直谋求建立“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行政计划为主导的国营媒体网络”的新闻事业新格局,新的报业格局当然是“各级党委主管的党报为统领的国营报业体系”^③。事实也是如此,除了早期保留几家“进步的”民营报纸短暂“配合”外,大陆的报业格局很快形成党报一统天下的格局。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报业形态固然在中共领导革命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毫无疑问在结构上是存在缺陷的,导致“新闻媒介不是党内多元声音的对话舞台,它只是也只能是权力之链上的一个链条,只能追随权力的变革而起舞”^④。进入“新时期”以后,这种党报一统的报业结构开始松动,“机关报一统天下模式演变成了多类型复合型结构模式”,而且“政治性在报业结构中的主导作用有所削弱,而市场性在报业结构中的作用力开始显现”^⑤。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新闻业市场化改革加速,诞生了一批以市场运作机制为核心模式的都市类报纸和报业集团,并且在激烈市场竞争中逐步做大做强,但也存在越来越商业化的弊端。简言之,虽经过40多年的“渐进改革,边缘突破”,中国新闻业发展仍然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还存在进一步发展的体制瓶颈。在这种背景下,

①薄克国. 风云激荡百年兴——访香港《大公报》董事长、社长王国华[N]. 大众日报, 2002-07-11.

②吴廷俊. 考问新闻史[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454.

③张济顺. 从民办到党管: 上海私营报业体制变革中的思想改造运动——以文汇报为中心案例的考察[C]//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 中国当代史研究: 第1辑.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9: 41.

④吴廷俊. 中国新闻史新修[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422.

⑤丁和根. 新中国的报业结构变迁及其阶段性特征[J].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 2005(5).

探讨并发扬“大公精神”，研究并借鉴《大公报》那些被历史证明符合新闻规律的宝贵经验，探索以新闻专业主义为基本内涵的“文人论政”独立办报模式，以此作为对主流党报的一种辅助，未始不是个有益尝试。

事实上，在当代媒体的日常新闻生产过程中，《大公报》和“大公精神”还时常作为“集体记忆”、理想愿景和思想职业资源得到唤醒、言说和叙事。一些党报如《文汇报》《广州日报》等指出，《大公报》奉行“大公精神”，坚持爱国立场，忠实反映人民心声，为读者敬仰。一些新兴的市场化报纸更是注重对《大公报》“带有自由主义价值观念话语资源的选择和利用”。2004年《南方都市报》设立“宏论版”直接是“以昔日《大公报》设立《星期论文》栏目”为榜样。^①《新京报》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新闻原创力最强的媒体”之一，其自我分析“根本原因”在于“媒体的性质和媒体人的志趣、情怀”。这种“志趣”和“情怀”的表达，使人不禁联想起初创时期的新记《大公报》。对于年青一代记者，《大公报》的新闻操作理念和职业操守更是影响颇深。许多人入行时就受到范长江、萧乾等老一辈大公报人直接或间接的影响。^②《羊城晚报》林丹被评价为“能写大稿，敢写大稿，不忌讳批评人但又不会得罪人的记者”，曾经表示“认同早年上海《大公报》的理念”，认为时政新闻记者就是要“小骂大帮忙”。前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柴静“也在不同场合展现了《大公报》给她留下的印记”，对《大公报》坚持“四不”方针而感到“心酸眼热”，还引用张季鸾的话来表达其职业理念：“大时代中的中国记者，下笔切忌嬉笑怒骂，要出自公心与诚意。”此类范例，不胜枚举。难怪有研究者感叹：“在中国新闻史上，能够如此连绵不断提供职业理念话语资源的报纸，除《大公报》外，确实凤毛麟角。”^③

总而言之，通过对《大公报》退场过程的细致梳理，力图展现这张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民营大报在大陆的最后时光，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其退场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然而，吊诡的是，《大公报》虽然早已从大陆现实世界中消失，却作为一种精神象征和一个不断膨胀的符号系统，透过各种各样的仪式和话语，持续回响在新闻社群的精神天空，从而作用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新闻人的传播实践。由此，进一步丰富《大公报》全部历史的考察与观照，拓展《大公报》学术认知的意义维度。

①郭恩强. 重构新闻社群：新记《大公报》与中国新闻业[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235-237.

②郭恩强. 重构新闻社群：新记《大公报》与中国新闻业[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237.

③郭恩强. 重构新闻社群：新记《大公报》与中国新闻业[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239-240.